

# 1933年中国人造出“手机”

## 比美国贝尔实验室造出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早13年

核心提示

如今,移动电话早已进入平常百姓家,成为司空见惯的通信工具。可是,就在十几年前,移动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,也还是地道的奢侈品。的确,在固定电话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,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移动电话实在是太高深莫测了。不过,你能想到吗?其实早在1933年,很多南京人就见识过这种新鲜玩意儿了。因为,这一年有位年轻的中国人,发明了中国的第一部无线电话机。这个时间,甚至比贝尔实验室首部汽车(移动)电话诞生的时间还要早13年。

### 一夜走红

#### 大学生的发明 惊动教育部长

1933年4月,一个叫王辅世的大学生成了上海滩的红人。上海的各家报纸,竟相对他进行报道。他为何一夜走红?原来这年4月,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,他发明了中国第一部“秘密无线电话”。

所谓的秘密无线电话,就是没有电话线也能正常使用的电话,也是后来出现的移动电话的前身。上世纪30年代,即使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,电话也是个新鲜玩意儿,使用的人多为外国人和中国的达官贵人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,电话神奇得犹如天外来物。至于没有线就可以打的电话,人们更是闻所未闻,实在稀罕。正因为如此,王辅世发明无线电话的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就传到了消息灵通的南京记者那里。

1933年4月11日,南京的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以“王辅世发明秘密无线电话”为题,简单报道了这件事情。报道中说,王辅世经人介绍,带着他发明的电话专程来到了南京。在南京,他见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、交通部与电政司长颜任光、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朱其清及金贤藻等人。这些人充分肯定了王辅世的发明。随后,王辅世的这部无线电话被带到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单位——中央研究院去检验。中央研究院充分肯定了王辅世的发明,并表示“不日当可正式呈请政府采用”。

### 是真是假

#### 第一部手机是中国人发明的?

王辅世发明的这部无线电话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?南京邮电大学的鄂广增教授告诉记者:“王辅世发明秘密无线电话的报道,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,那是因为,根据这则报道传递出来的信息判断,他的这个成果比当时最先进的美国贝尔实验室1946年造出的第一台民用汽车(移动)电话要早13年。”

不过,鄂广增教授认为,王辅世的这部秘密无线电话,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移动电话。“从《中央日报》的报道看,王辅世发明秘密无线电话是在1933年,当时还没有晶体管,所以,他的这部电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持无线电话,更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移动电话或手机。”

鄂广增教授说,关于无线电话的发展,从Reginald Fessenden发明并演示岸船无线电话起,到二次大战的军用无线电话,再到战后的民用无线电话,经历了漫长的历史。直到1979年,现代的蜂窝无线电话系统才在日本东京投入使用,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才出现。

在手机出现之前,无线电话早在二次大战时就已经应用于军事。正像《中央日报》报道的那样,王辅世1933年发明的这部电话,也是出于军事目的。



1933年4月11日,《中央日报》刊登了王辅世发明秘密无线电话的新闻。

### 令人遗憾 这款无线电话没什么人用过

王辅世研究出领先世界的无线电话,一时间让人浮想联翩。然而,遗憾的是,鄂广增教授告诉记者,对于这位年少成名的王辅世,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世界电信史,甚至中国电信史上,都不曾留下王辅世的名字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鄂广增教授分析说,一是他当时并没有申请专利,“当时的中国,科技制度很不健全,估计连申请发明或技术专利的机构都没有,或是没有专利可申请。”另外,“生产无线电话所需电子元器件如电子管等是国外的技术专利。我们直到解放后才会大批制造。所以,即便当时王辅世真正做出了无线电话,也是依靠国外的零件来组装的结果,想要大批量生产更不可能。”

在王辅世研制无线电话的同时,世界

各国也在研制。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,已经在战场上大批量使用移动电话。二战后期,美国通过了对华军援法案,于是这种移动电话也大量装备了当时的国民党军队。

王辅世的秘密无线电话,与时代擦肩而过,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。更遗憾的是,关于这款无线电话的庐山真面目,后人无缘见识。

1933年4月11日的《中央日报》,倒是刊登了王辅世和他的无线电话的合影。可是,因为年代久远,图案已经模糊不清,只隐约看得出来,这部电话比现在的普通电话略大,前面有两个喇叭样的装置。而据当时的新闻描述,“该机之构造,极为简单,用以行军,尤觉方便,惜以事属军事秘密,未能将内容尽行公布”。

### 王辅世其人

在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4月11日的报道中,还简单介绍了王辅世的身份:“王辅世君系江苏吴江人,年仅二十,初求学于天津南开,继转入同济,素日醉心科学,并富理想。”记者根据这段文字展开查询,惊讶地发现,王辅世其人一生颇为传奇。

### 留洋读博士 大半辈子教数学

江苏吴江市档案局的沈春荣告诉记者,王辅世的确是吴江人,“他生于1913年,上世纪30年代,从同济大学毕业后,去了德国留学。1942年4月底,他回国,曾在重庆志愿委员会工作,参与抗日。后来又去了桂林的无线电厂工作。抗战胜利后,他到了上海。1949年以后他先是在南京的材料试验所工作,后来,杭州筹建工学院,他又去了杭州。”

1986年,吴江修县志,沈春荣特地前往杭州拜访王辅世。当时,王辅世已经从浙江大学退休,“他的样子非常普通,你根本想不到他会是一个留洋博士、大学老师。我和他谈了一下午,了解到,他的夫人是个德国人,当时和儿子一起生活在美国。73岁的他,则独自一人居住在杭州。他告诉我,他早年在德国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,在浙大教的科目则是普通数学。”

### 父亲王绍鏊曾策动阎、冯抗日反蒋

记者还从沈春荣那里了解到,王辅世的父亲王绍鏊,也是从吴江走出去的名人。王绍鏊曾在清朝末年留学日本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与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,后改为统一党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王绍鏊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难救济会,又到北平与蓝

公武等人发起组织救国协会,赴张家口参加抗日盟军。1933年,王绍鏊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秘密党员。1936年6月,因策动阎锡山、冯玉祥抗日反蒋,王绍鏊在南京的浦口被捕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王绍鏊获释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王绍鏊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难救济会,又到北平与蓝

### 他的名字晚辈同事从没听说过

关于王辅世那部领先世界的无线电话,他的同行们会不会了解呢?记者转而向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老师打听,可惜问了好几位,他们都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王辅

世的名字。后来,通过浙江大学离退休办公室,记者获悉,王辅世是以副教授身份退休的,已经去世有10年时间了。

(据《现代快报》)

### 油画《开国大典》屡被删改

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,《开国大典》一直被誉为“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”。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,它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。然而《开国大典》命运却异常坎坷。它数次被迫修改,其作者董希文也因此而饱受磨难。

### 受命创作

1951年7月1日,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建党节日,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,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建党画展。中央美术学院受委托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,其中有巨幅油画《开国大典》。

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、知名教授董希文。董希文曾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,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的好评。他几次为领袖、英雄画像,并参加过开国大典。

接到任务后,董希文从开国大典摄影、图片资料里发现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,不合乎自己的想法。在他的想象中,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。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,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,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。

他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,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。画面上,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,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》。背后站着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宋庆龄、李济深、张澜、林伯渠、郭沫若等各界代表。

《开国大典》受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,并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。这幅画展出后,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
### 多次修改

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,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,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。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,《开国大典》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,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。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,名扬全国,也因这幅作品而在“文革”中遭到打击迫害,饱受政治磨难。

《开国大典》完成后才3年,就发生了“高饶事件”。作为国家副主席、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,8月自杀身亡,此后又被开除出党。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《开国大典》,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。《开国大典》原作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,从左至右依次是: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、李济深、张澜、高岗。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,为了不使画面损坏,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尝试后才动笔,删掉了高岗的画像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刘少奇因成了党内最大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而被打倒。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。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,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,而且还要另外补上一个人,还要牵动旁边的人。更为难的是,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,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,但体力衰弱,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。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,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。

1972年,当时中央“文革”小组为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,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,要求他重画此画,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。“文革”后期,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,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。这时董希文已去世,就找到了靳尚谊,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,就重新复制了一幅,这是此画的第四稿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随着刘少奇的平反,本着实事求是、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,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,决定将《开国大典》恢复原貌。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“文革”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,作了很大的改动,难以恢复原貌,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。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,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,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、叶武林。他们在《开国大典》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。至此,《开国大典》终于恢复原貌——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《开国大典》(复制品),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。(据《郑州日报》)

